

## 论《管子》的公正观

郝云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管子》一书在中国历史上较早且较全面地探讨了公正问题。首先,《管子》从个人公正与社会公正相结合的维度出发阐发了公正的基本内容并对公正的含义作了规定;其次,《管子》重点分析了法律公正、经济公正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对法律公正、经济公正体制的建构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说明;最后,《管子》从制度建设、结果公平以及信息对等几个方面探索了解决不公正现象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公正;法律公正;经济公正;制度公正;审分

**作者简介:** 郝云(1963—)男,湖北公安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生。

《管子》成书的年代与古希腊时期斯拉斯马寇、加里克里斯以及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相同。古希腊时期这些思想家们比较关注公正问题,但是,他们大都以朴素的观点谈论公正(如斯拉斯马寇、加里克里斯等),其范围也比较狭窄,限于命题式的表述,未加展开和详述。亚里士多德虽比较深入地谈论公正问题,但他比较注重谈论公正的一般形式。相比之下,《管子》一书则把公正问题放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探讨。将其公正观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管理的整个过程,这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

### 一、个人公正与社会公正相结合的公正观

《管子》是从执政的角度来谈公正的。它认为,“政者,正也”(《管子·法法》,以下《管子》一书只注篇名),把公正当作施政好坏与否的评判标准。这与儒家的公正观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把正直、公正视为政之要义。宋代的司马光认为,“政者,正也。为政之道,莫若至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上太皇太后疏》),讲的也是同样的涵义。政,就是公正,而且是极端的公正。不过《管子》对公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社会公正。即政策、标准的公正。它指出:“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法法》)。它认为公正是一种尺度,要做到公正,就是使用正确的标准来测定万物的命运。所以,圣人精修品德,树立公正之道以培育“正”,彰明“政”来

收稿日期:2002-09-23

治理国家。它还把“刑”、“政”、“法”、“德”、“道”五个政治内容的公正尺度作了规定,“罪人当名曰刑,出令当时曰政,当故不改曰法,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正》)。把“刑”的公正标准定为“罪人当名”、“政”的公正标准定为“出令当时”、“法”的公正标准定为“当故不改”、“德”的公正标准定为“爱民无私”、“道”的公正标准定为“会民所聚”。

其二是为政者的个人公正。即为政者是否有公正的品德,只有品德公正,才能正己正人。执政者要时刻反省自己是否做到了公正。“立常行政,能服信呼?中和慎敬,能日新呼?正衡一静,能守慎呼?废私立公,能举人呼?临政官民,能后其身呼?”(《正》)显然,为政者的“信”、“中和”、“正”、“慎”、“废私立公”、“后其身”是《管子》关心的重要内容。它认识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君臣上》)。这是因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权修》)《管子》进一步指出:“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法法》)。要知道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就会对自己的言行有所约束和限制。法令的施行,当政者就要先于百姓遵守法制,作出榜样,先自行法以率人。只有“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才有“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五辅》);“上离其道”,必有“下失其事”(《心术上》);先有“道德定于上”,方有“百姓化于下”(《君臣下》)。

《管子》在个人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评判个人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具体标准,也就是回答“公正是什么”的问题。

首先,认为公正就是无私。《管子》把“无私”看作公正的代名词。明确提出“立公”在于“废私”,从公与私的对立中去谈论公正的标准以及道德善恶标准。显然这里“公”的含义与儒家的有所不同,儒家对公私关系未有详论。《论语》虽然有8次谈到“公”,但只有一次“公”是指公平正直的,而没有一次是在公私比较中论“公”的<sup>①</sup>。《管子》认为要做到无私就要用“法”、“数”、“公”、“大道”来维系。它强调要“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任法》)。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理论,依靠公道而不依靠私情,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圣君失度量,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任法》)。《管子》对一切的“私”都是加以否定的,包括“私论”、“私议”、“私说”,一切“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反对君“失度量”,要达到绝对的无偏私。

其次,认为公正就是“中道”。《管子》指出:“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法法》)。《管子》把“正”视为中道,通过树立中道来培养正。有过或不及者都不足以为正。“中正”的要义是“止过而逮不及”,因为“过与不及皆非正也”(《法法》)。“过”与“不及”的度的掌握也是达到“正”之关键所在。

《管子》在谈到“勇”、“仁”之德时指出,“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正伤法。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法法》)。在此,“义”即正义、公正原则。在军队里只有“勇”之德,没有“义”就会给军队造成伤害。仁政如果没有正义原则为基础就会损害法律,这样长久下去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各种德目中,正义原则是最为重要的。二是“勇”与“仁”之德如果过了“义”、“正”这个中道就会走向反面,就会伤兵伤法。在部队里当然要“勇”,为政者当然要施行“仁政”,但是,不能超过度。

《管子》将其公正观的上述思想一以贯之地运用到实际分析中。

## 二、以法律公正与经济公正为主要分析形式

公正问题涉及诸多领域,《管子》的公正观涵盖政治、经济、管理、伦理等方面,但作为一部公认的政治、经济论著,它把法律公正、经济公正作为阐述其公正观的重要内容与形式。

### 1. 关于法律公正

《管子》非常强调法律公正,将其视为“正”的核心内容。“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正》)。说明要做到“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就必须以法律严明为先决条件,法律严明就是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讲法律公正。没有法律公正,“正之”就是一句空话。法律公正在社会公正中之所以能够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法的精神中内含着公正的品质。“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任法》)。如果离开了“法”,断无真正的公正可言。《管子》的法律公正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调法的制度要公正,要有严肃性和延续性,不能朝令夕改,随意变动。《管子》说“如四时之不贰,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正》)。“法”有如“四时”、“星辰”、“宵昼”、“阴阳”、“日月”,必须做到恒久不改,才能保持一定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因为,“号令已行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法法》)。

其次,执法人员要能够依法办事,不徇私枉法,否则就断无公正可言。《管子》说:“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版法解》)。公正无私、严明执法向来是天下大治的先决条件。《任法》篇说:“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主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以禁之,是以私说日蒸而公法日损,国之不治,从此产矣”。

再次,对执法人员的监督。对执法人员的监督是法律公正的保证。在中国历史上,监督的职能和作用是有限的,传统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性使监督的施行至少对“大夫”以上的官员难有作为,这就难以做到真正的公正。当然,这种状况也并非绝对。例如韩非就主张“罚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试图达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境地。《管子》极力主张为官者要遵法守法,权力要在法的控制下运行。它认为,“群臣不用礼仪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任法》)。这就是说,无论哪级官员,都不能离法而治事,企图以法来限制为官者,使其处于监督之下。《管子》还明确地指明了立法、行法、守法的职责。“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从法,此谓为大治。”(《任法》)国君立法、大臣执法、民众守法。执法之人要受到监督。唯一不受监督的是国君。“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臣上》)国君是最高统治者,是“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其余的人都要受到监督、制约。这里,虽然《管子》认为有不受监督之人(国君),但是,毕竟认为除国君之外,无论哪级官员都要受到监督,这在当时确属不易。

### 2. 关于经济公正

《管子》的经济公正主要表现在分配公正上。它说:“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乘马》)《管子》认为,只有“审分”,民才能尽其力,要想“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憊劳苦”,就要实行“审分民力”,这是人之为人,尤其是圣人之为圣人的基本

要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乘马》)。不能“审分”就做不到公正，做不到公正，人们就不会去做合乎公正的事。有如古希腊哲学家斯拉斯马寇所说的那样：“在最不公正的情形下，犯罪者是最幸福的人，拒不作不公正的人或受苦者，则是最为悲惨的人。”<sup>②</sup>

《管子》的分配公正主要体现在：

(1) 职位分配。职位分配是公正分配的重要内容。《管子》认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管仲就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分配职位的。隰朋善于升降揖让，明于礼义，就被命为大行；宁戚善于辟土聚粟，就被命为大司田；王子城父长于调兵，就被命为大司兵；宾胥无长于决狱折中，就被命为大司马；鲍叔牙敢于直谏，就命为大谏官。

把人员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去是一种公正；人们按照自己的岗位职责要求做应该做的事也是一种公正，前者属于社会公正的范畴，后者是个人公正的领域。苏格拉底的正义就是指人各尽其能、尽其职守，是一种个人公正观。柏拉图的正义观认为，从事各个职业的人都做到了相应的德就有了正义的国家。如：国王的德是“智慧”、武士的德是“勇敢”、商人农民的德是“节制”，只有这三者各司其能，不相互逾越，就产生了第四种德“正义”。《管子》在职位的分配上所持的观点主要侧重于社会公正，因为，在职位的分配上，没有社会公正就不会有个人公正。《管子》的这种定位是合理的，它把职位领域的个人公正问题的探讨放到了职业道德领域。

(2) 利益分配。劳动成果、利益的分配是公正分配的核心内容。《管子》对此作了深刻阐述：“夫施功而不钧，位虽高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虽厚不誉者多；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禁藏》)。赏罚要做到公平，如果赏罚做得不公平，给的官位虽高，效力的人却很少；赦免罪犯而不统一标准，恩德虽然很厚，不赞成的人却很多；光举事业不合时令，力量虽然用尽，事情还是不能成功；刑赏不当，杀人虽多，暴乱也制止不住。施以公法，刑罚虽重，下边也没有怨气；施以私心，奖赏虽多，人们也不感到欢欣。

(3) 土地分配。《管子》还特别强调了“均地”的重要性，它认为，“均地”是公正的起点，地不均是一切不公正的起源。“地者政之本也，是固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乘马》)。只有正地，才有可能正政。“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同上)。这体现了《管子》的农本思想，也说明了公正观在《管子》中是一以贯之的。

此外，分配公正还有一项重要要求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配问题，按《管子》的说法就是“与之分货”。《管子》认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乘马》)。“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同上)。国有大事就取用于民，无事就将财货归还于民。“与民分货”的思想是充分考虑到民众利益的表现，承认民众有与自己平等享有货物的权利，这体现了统治者对待公正的一种态度。

《管子》还试图揭示分配不公的原因。它认为一是由于职业分工造成的。贵族、富商、农民的分工不同，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慕、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轻重甲》)。食封贵族、富商和农民付出的劳动与获得的收益是不平等的。商人投机取巧，一本万利，而农民虽劳作终日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治国》)。这样就造成了“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到头来必然是“田

荒而国贫矣”(《治国》)的局面。

二是国家体制造成的。国家没有处理好税收与丰欠年的关系。无论是丰年还是欠年都一样纳税,不分谷物的贵贱,这样给商人以可乘之机。“发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国蓄》)。这就是说,在市场上,粮价有贵贱,物价有轻重,而富商蓄贾巡游于市场上,趁着老百姓的困难,利用这些机会,贱买贵卖,获得百倍之利。国君如果对富商巨贾在市场上的投机活动放纵不管,那就好象“一国而二君二王也”(《轻重甲》)。

### 三、探索解决不公正问题的途径

重视公正问题、揭示不公问题的原因,这就为解决不公正现象创造了条件。如何解决不公正问题,《管子》提出了有益的探索。

#### 1. 建立公平制度

(1) 建立规则制定与规则使用制度。规则是公正的保证,因此,制定公平的规则十分重要。《管子》认为,“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法法》)。意思是说:规矩,是矫正方圆的。虽然有锐利的眼睛和灵巧的双手,也不如用笨拙的规矩来矫正方圆。所以,巧匠能制造规矩,但不能弃掉规矩来矫正方圆。虽然圣人能制定法律,却不能废止法律而治理国家。所以虽然头脑明智,行为高尚,违背法律而治国,还是如同废弃规矩而矫正方圆一样。这里《管子》讲了巧者、规矩与方圆的关系。尤其是对三者之关系的哲理式的陈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法或“规矩”对人的行为约束的重要性以及规矩的建立对公正的意义。这里《管子》提出了两个问题,即制定规矩与使用规矩的问题。

(2) 建立功过赏罚制度。建立功过赏罚制度是确保分配公正的必要手段。《管子》认为,按声誉行赏,按谤言行罚不可。凭印象进行赏罚也会有违客观准绳。《管子》说:“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明法》)。如果为政者放弃法度而根据声誉用人,臣下就会背离君上而在下面结党营私了;如果依据朋党关系而任官,民众就会专务结交而不求实际效用了。所以,官吏治理不好,是为政者按声誉行赏,按谤言行罚的结果。这样一来,喜赏恶罚的人就会脱离公道而务行私术了。

《管子》还强调不私自赏罚。《管子》按赏罚的公私分明程度,把执政者分为三等。上等的“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任法》),这样的人会按照规则办事,称为“上主”;中等是“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同上),这样的人不采纳大臣忠言,脱离左右近臣,专门根据个人心愿断事,称为“中主”;下等的是“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同上),这种人背离公法,损害正心,这种人称为“危主”。可见,赏罚无私是最重要的。

(3) 建立人才“三选制度”。管仲辅佐齐桓公制定了严格的人才制度,称为“三选制度”。其过程是“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修德维顺,端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谤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小匡》)。

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中,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者不在少数,但象齐桓公自下而上逐级遴选、不分贵贱等级的选才方式却是极为罕见的。这种选才方式之所以为人称颂,还不仅在于其重视人才的态度,而在于其选才有公正的制度保障,在于选才的严格标准与尺度,大大避免了主观随意性与非公正性的发生。

《管子》选才制度的公正性还在于,选出的人才要经过不断检验与考课,通过一年的实际考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者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者而事治者则用之”(《明法解》)。这样可以将那些投机取巧、欺世盗名、华而不实的所谓“人才”剔除出去,宁缺毋滥。《管子》在选才上的严格的求真态度,充分体现了其公正性。

## 2. 注重结果公平

当时,先秦齐国贫富差别比较明显,“贫者重贫、富者重富”的现象客观存在,一边是“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弛,多酒醴而靡”(《侈靡》)豪门贵族生活奢华、装饰车马尽情奔驰、酿造美酒尽情享受;另一边是“仓廩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同上)。粮仓空虚而农民没有存粮,农民靠卖儿女生活。这种现象皆由社会分配不公所致。这样长久下去,就会出现贫富悬殊的状况。如不重视,天长日久,势必引起混乱,国家就会发生动荡。《管子》认识到:“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揆度》)。因为“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国蓄》)。“甚富”与“甚贫”都会给统治造成危害,那就是“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

《管子》认为要解决“甚贫”与“甚富”的问题应采取下列办法:一是“夺富予贫”。它说:“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揆度》)。意思是说,对富者的财富能够夺取,对穷人能够给予,就可以治理天下。如何“夺”与“予”?《管子》提出了可行之法。“夺”的方式主要是用价格政策使商人无法获得暴利,“予”的方式主要是给农民以小额的生产或生活资料贷放。二是“散积聚、钧羨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国蓄》)。防止商人乘机获取暴利,对贫者给予贷放,征税不同,利用财政方式以调剂各地民食并减轻租税负担,令富豪之家以现金或实物贷给农民,低其利率或劝其不收税,甚至劝其不索还本钱。三是“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治国》),让各项职业的人们互换行业,这样“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同上)。

“贫者重贫、富者重富”是一个结果公平问题,《管子》对结果公平的重要性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尤其是提出了通过价格和税收政策来实施调控,这在当时实属不易,它对现代宏观管理调控政策有较大的借鉴作用。目前,许多国家对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十分重视,并提出了许多解决的方案,普遍采取的有:(1)通过宏观调控,以高额累进税对富者加以限制;(2)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补偿收益较低者或无收益者。这与《管子》所运用的方法极为相似。

应该指出的是,结果公平固然重要,但不能由此而忽视效率问题,也不能违背效率优先的原则。因为没有效率,公平就无实际意义。《管子》的“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的公平观有以牺牲效率来实现公平之嫌,实际上还未脱离“不患寡,患不均”的传统观念的轨迹。此外,它的“使农、士、商、工四民交易能作”以求结果公平的想法也不太现实,姑且不论这与它的“士、农、工、商”分业而治、“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的思想相矛盾,就职业的相互交换以求结果公平的方式实施而言,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不过是切实际的幻想而已。即便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新的贫富差距现象的出现也将在所难免。

## 3. 提倡信息对等

《管子》还看到了由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等,而出现不公正的情形。因此,它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改变。主张,“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得

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立政》)。凡要办一桩事情,一定得先公布法令。质言之,就是办事之先,要把赏罚的办法和政策明令公布。负责办事的人要严守法令以施行赏罚,在谋划和检查所办之事并向朝廷报告的时候,必须同时报告执行赏罚的情况。如有不符合法令精神的,哪怕有功效和利益,那也叫“专制”,也是死罪而不能赦免的。举事之前颁布赏罚的法令之后,事情才可以正式举办。

《管子》还认识到,执政者只有做到了信息公开,信息对等,人们受到惩罚才无怨言。在《枢言》中指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贵明。”意思是:行赏公开就不会耗费资财,刑罚公开就不是残暴。赏罚公开就是最高的德政。所以先王很注重公开性。只有公开才能做到公平,才能使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也才能限制专制的发生,避免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

注释:

- ①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21 页。  
②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28 页。

参考文献:

- [1]谢告范,朱迎平. 管子全译[M].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2]郝云. 管子与现代表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约翰·罗尔斯[美]. 正义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GuanZi's View on Fairness

HAO Yu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GuanZi is a book which studied the issue fairness relatively early and completely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First, GuanZi explained the basic contents of fairness from the angel of the combination of personal candor and social fairness and offered the definition of fairness; Second, Guan Zi put great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of law fairness, economic fairness and their concrete manifestation, and gave an elucid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fairness, economic fairness systems; Finally, GuanZi probed on the concrete measures to solve unfair phenomenon from system construction, result fairness and equal shared information.

**Key words:** fairness; legal justice; economic fairness; system fairness; cautious distribution